

陈漱渝 主编
邢小群 孙珉 编

中

回应韦君宜

大众文艺出版社



HUIYING WEI JUNYI

游去一房一钱袋，
子延我献延，
我还安的丁安抚鼓
我是家之爱年便平舞
抱着感的人轻，我拿
着满腔我世生都创起
幸福的感的人为是，我续
延不志但丁给继
奔过同
腔投有实命会伤枪
来继续
的党我党安战
的党将愿斗。
事得安和。
罪到抚温到

中

回應書卷宜

◎ 鍾肇政 著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主编 陈漱渝

回应韦君宜

邢小群 孙珉 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所认识的胡耀邦同志

为耀邦同志写悼文，我觉得为难。写一点点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他，觉得太没意思。写他一生的功绩，又绝非此短文所能概括。只罗列一些零碎印象吧。

1952年，我在团中央工作，耀邦同志从川北行政公署调团中央，任团中央书记。在我们心目中，他很活泼，和下级干部相处也很随便。每逢团中央搞报告、重要文章之类，他总要找几个“笔杆子”一起起草，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笔杆子你一言我一语连句成文后，耀邦同志总要沉思一下，用手摸摸脑袋：“啊呀，不知主席的盘子怎么样？”几乎每一件事他都要考虑“主席的盘子”，那种虔诚而认真的神情，我至今记得。

1957年，他是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我已调到作家协会。直到运动快结束才得知，团中央打了大批的“右派”，比例在当时的各部、委级单位里算高的。

到后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两三年就来一次，直至爆

发了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有在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中幸免于难的干部，此时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耀邦本人也是一开始就被“揪出”。后来由于校回来后，不给工作，他住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的一个大院里。当时有许多“未解决问题”的老干部找他发牢骚，大院里的团中央的普通干部们也和他来往，大家谈得很热闹，很自由。到后来，听说还有在团中央经他手被打成“右派”的人也去了。我也去过。

1975年，一些已获“解放”的原来的负责干部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耀邦同志也算一个，暂充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但是上台不久，就被那里的造反派开大会批斗，甚至专门举办了中科院“文革”成绩展览会，以他的“罪行”为前言。我这时曾一个人偷偷跑到他家看望他。我说：“耀邦同志，听说还拉你到外地大连去游斗，你可受苦了。”他很冷静地望着我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语气中透着一种我所不熟悉的镇定和冷峻。之后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再次被打成中科院翻案风的罪魁祸首，不堪批斗，躲进了协和医院。我和杨述带着女儿和未来的女婿潜往协和。医院要我们留下姓名、单位，我们就叫两个年轻人出面签名。我们则作为“随从等人”混了进去。进了病房见耀邦半卧在沙发上，面有病容，身边放着一本打开的线装《全唐诗》。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务必保重身体。”他点点头，拿过那本唐诗给我看。那是一首并不常见的律诗。原诗我已不能

背诵，现在也无力去查，只记得写细柳营军容甚盛，而老臣的结果却甚为凄凉的意思。

不久“四人帮”垮台了。帮“四人”的大臣们下去了，但是还有不少人，作为毛主席的人留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有人要我直接去找刚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耀邦同志。我想了想，觉得出于人情去找他不妥，该怎么办他会办的。后来中组部新来的副部长甚至跟我推心置腹到这样程度：“杨述没有问题，这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的案子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子的，现在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而且，毛主席的话句句要照办。这事要解决，得慢慢想办法。”办成事多难啊！至今回想起来，仍能感觉到当时那场斗争中的硝烟弥漫。其间，不断有老朋友告诉我：“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解决了。胡耀邦说，对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急哩。”后来才明白，耀邦同志的确比我们这些当事人还着急，他想推翻的不是一两桩“如山铁案”，不是一桩“文革”中“御笔亲点”的铁案，而是自解放以来所有运动被错整过的一系列历史的错案。

1978年11月，杨述和那位×××果然算是较快地解放了。“三家村”、“四条汉子”、彭陆罗杨……这些经毛主席画过圈的大罪人，后来陆续获得解放。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不止十年冤案，而是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到处传说胡青天的故事。我的一位被划为

“右派”、一直未平反的老同事，得了癌症，把申请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自己却很安详地写小说，和朋友谈心，居然一点不着急。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会有结果的。”果然，在他去世前，接到了改正通知。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历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之外，后来再也没见到过的。

接着，便是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听说耀邦同志不仅积极为他当年亲自划的“右派”平反，而且把有的同志找到家里当面认错。震动文艺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案翻案了，丁玲从北大荒回来了，陈企霞回来了。由毛主席亲自定案而三十几年未查出任何根据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竟也被推翻了。胡风也从狱中回来了。补开冯雪峰——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的追悼会时，我们不知道耀邦认识冯雪峰，没有想到请他，后来他却为纪念雪峰题写了纪念册的书名，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建国以来所有运动造成的不把人当人的政治待遇全被取消了，共产党真正开始关心、爱护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了。这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不把人当人，还谈得到什么改革不改革呢？耀邦功绩，简直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人的解放的新时代，这才有了得以推行经济改革的基本条件。

本文写到尾声，正值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之日，会内外同

声恸哭。一位亲友来告，4月15日发布讣告时，她看见一个“文革”中被抄家、赶出北京的工商业者兼教师，后来回来的老人，听广播时落泪了。

(1989年4月20日)

不该被遗忘的人

——记杜绍西

为纪念共青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创办，我写过不少文章，又接受过若干次采访，好像我已经变成了《中国青年》的元老之一似的。凡是“元老”们，虽不敢说“名垂青史”，至少也已记录在案，对得起在延安那一段工作了。最近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我的直接领导人科长杜绍西呢，我们忘记了他了，这是过失性的遗忘，是不该有的遗忘。

那是1937年，我刚到延安，分配到《中国青年》工作。这个单位，对外称《中国青年》科，科长就是杜绍西。他的名字，我是早在北平时代就知道的。他本名杜书田，北师大学生。他们师大，左派和右派对立得特别厉害。右派有所谓“饭团”，还有好几位出名的右派教授，如杨立奎和熊梦飞。那时这个杜书田就常常代表学生会，和这些右派教授们争论。这都是登载在北平学生刊物的。所以一见杜绍西的面，一听介绍他就是杜书田，我就觉得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个儿很高，

戴副眼镜，人是温文儒雅，连说话都不高声，不知道他怎么和右派教授争吵的，与我们学校那几位少壮派与右派一闹不好，就要挥拳相见的，真是大不一样。

他并不是常见的“爱好文艺的青年”，但他是一位很尽职、很仔细的科长。我得承认（这话早就应该在我那些次接受人家采访时提到了）杜绍西是第一个手把手教我当编辑的人。我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也被称作能动笔的，也在校刊里当过编辑，那只是组织别人写稿，稿来了能用就往外发，哪知道编辑的一套。是杜绍西告诉我，对每篇来稿，必须细看，不合适的地方，必须动笔改。稿齐以后，必须考虑搭配长短适中。稿子发出，又要自己画版样，不能随印刷厂排了就算了。更重要的是，我有一次经手发出一位负责人的稿子，杜绍西特别嘱咐我：“对于领导人的文章，可不能因为他是领导，就对于文中错字或误用什么典，马虎不管。要知道，这一错误传出去，只会损害领导人的工作和信誉。对他只有坏处没好处。”这句话对我印象极深，一辈子不能忘。至今我每看见人们因1954至1956年左右有人把“故步自封”误写成“故步自封”，从此习非成是以讹传讹，就想起杜绍西来。

离开《中国青年》后，杜绍西被调到了西北局，担任了高岗的秘书。我不知道他这个行端立正的君子人，除了工作与这个高岗个人有任何关系，但是，到1957年，他竟被划为右派了。他人在东北，我跟他已经没有来往。后来听说他在改正以前已经去世。直到两年前收到杜绍西夫人王开很偶然

问候的来信，问：“你还记得杜绍西吗？”我恍惚记起了那温文儒雅的杜绍西，真是，我们怎么竟在纪念《中国青年》历数刊物功臣的时候忘了数上他。我十分不安，且为我自己接受那些采访而惭愧。

(1991 年)

敬悼冯友兰先生

得到冯友兰先生去世的消息，觉得冯先生虽并不以革命人物的声名传世，但我们当学生的回想他老人家的德业造诣，以至平日为人，实应向老师表示一点应有的敬意。我只能写几句琐事。

我实在不是好学生，还有许多当年和我一起念书的民先队同学们，都不是好学生。我进清华哲学系一年级的時候，冯先生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这正赶上何梅协定签订，“一二·九”运动即将爆发，谁还有心念什么书？冯先生上课喜欢点名，我就因救亡运动而常常缺课，结果弄得中国哲学史课因缺课太多，而不及格要补考，（是否重读，已记不清了）。但是，在补考前，我仔细读了冯先生的大著《中国哲学史》，才觉得早应当细读此书。我和几位本来并不是不喜读书的同学，异口同声赞赏前言中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胸襟抱负啊！我们觉得了，书是不应该不读的。这次补考，我考得很

好，得了九十五分。

可是救亡运动中工作实在太忙了，我终于还是没有好好读书。同学们搞长期罢课，想请政治态度较好的先生来登台讲讲救亡。我被大家派去请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见了我，只是温和地一笑，说：“你们这次抗日的表示，也表示得有声有色了。现在怎么还未回来上课？”那“有声有色”四个字说得很重。而幼稚的我，对冯先生的话却一句也听不进，转身就走了。

先进同学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1936年2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一首诗，后来黄诚的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怎样外传，很少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失守，学校南迁，大家分散。学校先搬到长沙，大家挤在圣经学院内。来的人先报到，一下子开不了课，学生们只有在街上遛弯，吃凉薯和米粉。回到宿舍免不了对学校和个人前途发发议论。我在苦闷议论中间，觉得应当下决心，已经打算了先去武汉找党的关系。一天，在小街上迎面遇见了冯先生。在打招呼为礼之后，在中路边稍站了两分钟。我说：“冯先生，我想离开学校不念书了，我想抗战，想找个机会参加抗战。”冯先生听了这话，沉思片刻，便点点头：“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和我握手道别。冯先生这次，并没有教我在混乱的局面下，

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平心静气动心忍性去读书（这是我预先猜想的），却在街头庄严地鼓励我——一个青年去抗战，这印象，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此离开学校，丢下课堂里的书本了。直到在延安，有一次老同学蒋南翔向我介绍冯友兰先生新著的书《新事论》。他说：“这书写得实在好，他自己不标榜唯物主义，但是这实在是唯物主义的，你看看那一章《谈儿女》，我们这些人写不出来。”我把这本书看了，完全同意老蒋的看法，而且还到党校图书馆去继续借看了冯先生的《新理学》、《新世训》。我这学生离校之后好久，算刚刚知道了一点他的新理学的主张和思想深度。在离延安之后好几年，又找着《新原人》和《新原道》读了。冯先生的贞元六书还有一本《新人言》没买到。读完五书，才觉得我这个哲学系的学生，实在对老师不起。

这已经到大军入城欢庆解放的时候了，我虽有过一点继续读书的兴趣，也没有了续读的功夫。冯先生则从头搞起《中国哲学史新编》来。他大约也早忘了我这样的学生了。

冯先生在我脑中的印象，除了解放前他讲的哲学，最主要还是他的胸怀，使我永不能忘。解放后虽并无来往，在别人以各种角度提到冯先生的时候，我早就想提出自己所知。故在先生已归道山之后，谨以数语说说愧怍之情，且表高山仰止之意。

（1991年）

我的老同学王瑶

1949年春，我和外子杨述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重见老同学王瑶，都非常高兴。因为王瑶本来是《清华周刊》的总编辑，积极分子，他入党还是杨述监督的。自从抗战爆发，他因单身在外，找不到人，失去了组织关系，从此埋头书本，治古典文学，去当教授了。没想到他现在又主动来找我们。而且这次来访，与从前一样，穿一件蓝布大褂，手扶着自行车，想必是由清华到城里的二十几里地，骑车来的。他临走时，一边飞身上车，一边笑着说：“你们别以为教授都是老头子，现在，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飞而去。他那年三十三岁。我对杨述说：“他没有怎么变呢，还是老样子。”

后来由他的文章和在校表现来看，他也真的还是跟当年“一二·九”时期一样，天真未凿。从1955到1958这几年，见他写了不少文章，参加中央所号召的大批判，从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到参加周扬牵头的“文艺界一场大辩论”——批判

丁玲等等。尽管与古典文学毫不相干，凡是这些文艺运动，他都热情从事。后来还当了《文艺报》编委，又一下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和从前在清华时期一样，上级说句干，提笔就干，简直不像一位搞古典文学的教授，而变成活跃的当代文艺界积极分子，回来和我们一块儿滚了。

可是，运动越搞越厉害，慢慢的有些积极分子就跟不上了，包括我自己。我们天真的老同学王瑶终于落伍。大概从内心说，他没法再紧跟这些运动，政协委员和《文艺报》编委都终于被撤掉了。他仍然老老实实去教书了，但是他的言论仍然不尽合拍。先听说他们北大中文系在批判他。又说他重新犯了犟气，不肯再作自我批判。说话又一向爱开玩笑，成了系里比较难对付的一位教授。

有一年，杨述带一个大学工作组去北大了解情况，听中文系的工作人员汇报这些难办的教授（包括王瑶）如何如何。他就跟王瑶个别谈了一次话，问他：“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到底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的！”杨述没话可使他服气，回家告诉了我，我也只有叹口气。

后来我们来往不多，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论何人，大家倒霉，就不必提他了。1974年左右吧，我已经“解放”，奉命“走群众路线”，把“工农兵”作品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讨论。我带了一本很不高明的工农兵稿子去了北大。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们开会发言，我在旁边记录。到休息时间，

从旁边一间教室里，忽然出来了王瑶，和我握手道故。我见他又工作，重执教鞭了，自然也高兴，问他：“你们系里的文学史课，用什么本子啊？”他摇头一笑说：“没有什么文学史课，也不用本子。”见我还要追问，就干脆说明：“今天你来这里给学生开会，这就是一课。我在旁边坐着，就是我上课了，你还问什么？”

这种教学，这样的大学，在十年“文革”中不足为奇。我由此了解了 he 当时的处境。

好容易熬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又得见面。我自 1979 年起，每年在清华校庆时必返校，每次返校时常见到王瑶，闲谈一会，这时我们都老了。有一次我问他：“你现在还写东西吗？”他笑呵呵地说：“老了，老了，我现在要是什么都不写了，就是坐以待毙。要是还写呢，就是垂死挣扎。不过还是垂死挣扎比坐以待毙好。”我也为之大笑，说：“我也跟着你垂死挣扎吧。”看得出在改革声中，他重新意气风发的神气。

1988 年底他的死，不少同学互相传话，说他死得不安心。我真想再去找王瑶自己问一问，奈何他竟已去了。

(1992 年)